

研究資料彙編

徐復觀教授與近人學術討論綜述(二)

謝鶯興*編

徐復觀與學者間的學術討論，還有就《尚書》篇章見解的異議而引發的議題，如「周公旦是否踐阼稱王」、與「五行有關的文獻」；探討中國藝術精神，提出石濤、黃公望畫作的看法而引起的討論；從〈趙岡《紅樓夢新探》的突破點〉引發與趙岡的討論；因胡適〈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而引發的東西方文化的討論等等議題，仍分述如下：

八、周公旦踐阼問題

屈萬里在〈關於所謂周公旦「踐阼稱王」問題敬復徐復觀先生〉前言說：「去年秋冬之際，徐復觀先生來函，於拙著〈尚書釋義解大誥『王若曰』之王為成王，解康誥『王若曰』之王為武〉；以及拙著〈西周史事概述〉一文中有關此類問題之敘述，表示異議，云將為文辨之。予即復函，歡迎指教。至十二月杪，承寄示〈與陳夢家屈萬里兩先生討論周公旦曾否踐阼稱王的問題〉一文」而持續的討論。

1. 〈與陳夢家屈萬里兩先生商討周公旦曾否踐阼稱王的問題〉，徐復觀，《東方雜誌》，復刊第 6 卷 7 期，1973 年 1 月 1 日

按，是篇第一節「現代中國史學的反省」，提出治我國古代史有兩大困難，促成我國疑古派的出現，幸賴近幾十年考古方面的重大發現。第二節「周公問題在歷史中的演變及其重新提出」，對於周公曾否踐阼稱王，認為兩漢及其以前的相關資料中都是肯定的，到了宋代則澈底否定，指出陳夢家、屈萬里兩位是重新走上宋人的老路，而屈氏的觀點可能是受陳氏的影響。第三節「武王成王的年齡問題」，提出禮記文王世子的文獻問題，指出屈氏談武王年齡有意漏掉逸周書及竹書紀年的材料；武王死時成王的年齡，提出先秦的材料都只說「成王幼」這類的話。第四節「唐誥的問題」，討論周公曾踐阼稱王，惟在西周有關文獻的自身來求內證，陳氏與屈氏都認為康誥中的王是武王，徐氏則認為唐誥、酒誥、梓材三篇中的「王若曰」、「王曰」皆是踐阼攝政的周公。第五節「尚書中康誥以外的有關文獻」，引大誥內容，談「寧考」、「予」、「沖人」、「小人」等稱謂上的問題。第

*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六節「尚書以外的兩點討論」，一是關於棄后稷的問題，一是屈氏引《論語》泰伯孔子說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提出轉述性史料可信程度，與轉述者的性格及講話時的動機有關係的觀念。

2.〈關於所謂周公旦「踐阼稱王」問題敬復徐復觀先生〉¹，屈萬里，《東方雜誌》，復刊第7卷7期，1974年1月1日

按，是篇就徐復觀去函及〈與陳夢家屈萬里兩先生討論周公旦曾否踐阼稱王的問題〉，針對「周公踐阼稱王」問題的答覆，認為二人之說的差異，「是在對於有關資料的解釋方面」。首先是「大誥中之王是否周公的問題」，徐氏認為周公是否踐阼稱王，在兩漢及其以前的相關資料(含尚書)中，今古文學家也是肯定的；他據書序及史記所說，認為是成王。二是「大誥中『洪惟我幼冲人』及『予惟小子』等語的解釋問題」，提出「予惟冲人」一語未見尚書各篇中，亦對此「洪惟」、「予惟」的「惟」字作「思念」解，提出異議，認為是「發聲詞」，王亦可自稱小子或冲子。三是「大誥中的寧(文)考是否專指文王而言的問題」，認為「文考」應為泛稱，猶後世之稱「亡父」。四是「康誥中的問題」，認為因「錯簡」而產生的問題。五是「周誥中關於『周公稱王』說的反證」，引召誥、洛誥與多方篇對看。六是「『踐阼』與『稱王』」，認為是二件事，引各書證之，「踐阼」是史實，「稱王」是「空中樓閣」。

3.〈關於周公踐阼問題的申復〉徐復觀，《東方雜誌》，復刊第7卷10期，1974年4月1日

按，是篇係就屈萬里談古代史有關的書籍和文章而發。首先提出屈氏答文「一、大誥中之王是否周公的問題」一節引書序、史記、尚書大傳等材料，駁斥他的周公踐阼稱的肯定之說，徐氏認為二人陳述是相同，復提出屈氏引作立說證明文獻是需要考查；次就「六、踐阼與稱王」一節，認為踐阼即稱王。第二節就屈文「二大誥中『洪惟我幼冲人』及『予惟小子』的解釋問題」的答覆。第三節就屈文「三、大誥中的寧考是否專指文王的問題」，指出寧考為武王之失，列舉于省吾、吳闈生二人之書駁屈氏「稱文考而不綴文考名字的多至不可勝數」之說。第四節就屈文「四、康誥中的問題」，提出他所說的「周公在經營洛邑開始之同時，封康叔於衛」的資料，是從唐誥、召誥、

¹ 篇末題「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萬里記」。

洛誥及有關的資料中抽聚而得，故不認為是「錯簡」。第五節就屈文「五、周誥中關於周公稱說的反證」及「七、餘說」的問題，依《史記》仍認為多方篇的「王若曰」實為周公；其次是周公攝政七年時成王應是二十歲以上之說，二人並不相合，認為是因他沒有辯證武王是在伐殷之後第幾年死的問題。

4. 〈「釋周公受命義」續記〉，黃彰健，《東方雜誌》復刊第 7 卷 11 期，1974 年 5 月 1 日

按，是篇雖是繼〈釋周公受命義〉（見《大陸雜誌》46 卷 5 期），但起因於讀到屈氏〈關於所謂周公踐阼稱王問題〉一文，以其仍主張大誥的「王若曰」的王為成王而發。引〈金縢篇〉與〈大誥〉、〈洛誥〉、〈酒誥〉、〈康誥〉、〈盤庚〉等篇互看，提出三個理由說明周公係以公爵的身份而攝行天子政務。次則提出攝政制度因時代而有變遷，認為召誥之撰寫在洛誥之前；從〈多士〉認為周公在攝政時曾踐奄，〈多方〉是記成王曾踐奄，佐以〈書序〉證之。

九、與五行有關的文獻討論

徐復觀〈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釋的問題〉於前言概述：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樂調甫〈梁任公五行說之商榷〉、呂思勉〈辨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齊思和〈五行說之起源〉、日人狩野直喜《中國哲學史》、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五帝本紀〉、重澤俊一郎《中國合理思維之成立》等篇文章內容，認為：「對五行觀念之演變，均有很好的見解，惟皆語焉不詳。今草此文，意在進一步探索此種觀念逐漸演變之經路。並以此為座標，對先秦若干有關文獻成立之時代問題，看能否提供新地解決線索。」²屈萬里〈對於「五行有關的文獻」之解釋問題，敬答徐復觀先生〉之前言說：「去年歲初，我曾經寫了〈尚書中不可盡信的材料〉一文，送給《新時代》。當三月十五日那篇文章在《新時代》一卷三期刊出的時候，……不久，我便接到徐復觀先生的來信，大意是說，他看了我那篇文章之後，甚為不悅；打算作一篇文章批駁我。」³其中駁辦拙文的部份，主要的是關於甘誓和洪範

² 戴君仁〈陰陽五行學說究原〉前言說：「在民國十二年時，梁啟超發表了一篇陰陽五行說之來歷，引起了學術界的辯論，如呂思勉、樂調甫等人都有文章。後來顧頡剛做了一篇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十餘萬字的長文，討論得很澈底。近年來，在臺灣王夢鷗先生寫了一本鄒衍遺說考，李漢三先生寫了一本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詳密過於前人。」與徐復觀所說略同，可參見。

兩篇著成的時代問題，也偶爾涉及堯典和禹貢等成書的時代問題。」據屈氏之說，此一討論，實因〈尚書中不可盡信的材料〉一文而起，著重在《尚書》中的幾篇文章，亦即徐氏所云「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故附在「周公旦踐阼問題」之後。

1. 〈尚書中不可盡信的材料〉，屈萬里，《新時代》，第1卷3期，1961年3月15日

按，是篇「所謂尚書中不可盡信的材料，這尚書二字，是指伏生所傳的二十九篇尚書而言」，「所謂不可盡信的材料，是指後代人所傳說的古代史事而言」，首先分別指出：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牧誓、洪範等篇有其他的證據，足以證明它們是晚出之書。如：1.以洪範是談五行最早的文獻，認為堯典的五行之學，是在五行之說盛行以後的現象，而定洪範篇不會早到戰國之前；2.以禹貢著成約在春末來，皋陶謨的「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是根據禹貢說的，定皋陶謨不會早過春秋末葉；3.以考古史料西周時還沒有鐵器的使用，禹貢既說梁州貢鐵鏹，認為禹貢著成時代不會早到西周，不會在秦穆公以前；4.以甘誓提到六卿、五行、三正等名詞，認為該篇的作成時代1，在鄒衍之後秦八年之前；5.以牧誓文辭平易及夫子一詞的使用，認為是篇為戰國年間人的作品；6.以荀子、左傳已引用之文句，認為洪範作成時年代，約當戰國初年。接著略談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金縢、盤庚等篇的成書年代問題。說明治史的目的在求真，尚書中的材料不能盡信。

2. 〈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釋的問題〉，徐復觀，《民主評論》，第12卷19期至21期，1961年10月5日至至11月5日

按，是篇分為十一節論述：第一節從文字學上看陰陽二字之原有意義。第二節詩經的陰陽觀念，認為沒有後來作形成萬物原素的陰陽二氣的意義。第三節春秋時代陰陽觀念之演變，以左傳、國語二書記載來說明陰陽觀念的發展。第四節春秋時代的五行觀念，指出從左傳、國語才有五行的名詞，皆指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五種實用資材。第五節我對今文尚書在文獻上的一般看法，將尚書二十八篇分為三類，一是開始並無原始文獻，只有口頭傳說，後來由史官加以整理編纂寫成文字的材料；二是將原典重加整理過的材料；三是傳承下來的原始資料。第六節甘誓的成立時代及其中的五行問題，是就屈氏〈尚

書中不可盡信的材料)關於甘誓、洪範的部份加以檢討的,指出屈氏認為「在西周和其以前的文獻裏,沒見過六卿這一名詞」、「五行之說,源於洪範,而洪範乃戰國時的作品。終始五德之說,則創自鄒衍。甘誓說有扈氏威侮五行,它這話是說有扈氏若不起應運而生的帝王;它已用了終始五行德之說,據此,可知它的著作不在鄒衍之前」、「甘誓中有『怠棄三正』的話」等三個論證,是不容易成立,認為甘誓「乃夏典之遺,經周代史官及孔門曾加以整理過的」。第七節洪範的成立時代及其中的五問題,認為洪範之所以成為問題,大概始於劉節的《洪範疏證》,提出三點討論;接著就屈氏對洪範著成年代,大體採用劉節之說,只是從戰國末年提早到戰國初年的五點論證進行研討。接著提自己認為把洪範的五行與鄒衍的五行相附會的,實是西漢迂愚之儒所完成的結果。第八節戰國時代陰陽觀念的演變與易傳的發展,此節提出對陰陽觀念作決定性的演變的,恐怕是順著易傳的發展而來。第九節易傳與道家的關係,提出易傳與道家兩者共同之點,乃在以陰陽解釋宇宙的創生變化。第十節戰國時代五行觀念的演變與鄒衍,認為陰陽五行,原係兩個不相干的名詞,其演變亦來自不相干的線索,五行觀念的演變,他推測是在社會低級迷信中醞釀出來的。第十一節陰陽五行的融合--從呂氏春秋到董仲舒,提出進一步把陰陽、五行、天文、律曆、風習及政治的理想,組織成一個完整系統的是呂氏春秋的十二;陰陽五行思想,在西漢形成了更完整的格架,因而發生更大的影響,應當是出於董仲舒。

3.〈對於「與五行有關的文獻」之解釋問題敬答徐復觀先生〉,屈萬里,《新時代》,第 2 卷 2 期,1962 年 2 月 15 日

按,是篇首先說明因徐氏〈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釋的問題〉對甘誓和洪範兩篇著成時代問題,偶爾涉及堯典和禹貢等成書時代問題的論證,提出個人見解;特別是就徐氏將尚書分為三類中的第二類「將原典重加整理過的材料」所列的甘誓等六篇,所提出的兩點理由加以答覆。接著就徐氏所用判斷問題的方法,如歷象星辰是否受古巴比倫影響,出土銅器中有鐵的成分的文物是否西周初年,「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的解釋等;復就徐氏所提對六府、六卿、呂氏春秋的成書、洪範一條一條列舉的形式等的見解,提出說明;再說徐氏誤會他所論說,如洪範、甘誓等「不可盡

信」說法的誤會之處。

九、談藝術

藝術類的討論，可分為兩個議題，一是環繞在石濤³關於石濤的議題，徐氏在〈增補版自序〉說：「《石濤之一研究》印行後，現時已無存書。而印行不久，即發生石濤生年問題的熱烈討論；這樣一來，逼得我對一問題，不得不重新費一番工夫去探索，因而先後寫了六篇文章。」又說：「現在我不僅從書札的內容上斷定永原藏本是真，並且從書法的沉著痛快上，也斷定此本是真。」一是黃大癡富春山居圖⁴，徐氏在〈自序〉篇末說：「我在彙刊此一小冊時，未曾把其他各位先生的論文收在一起，這是一種缺憾。但可以負責地說，我決不曾掩沒或逃避過各位先生一條有力的論證。……為了促進學術進步，便須提倡合理討論的方法和態度。」

(一)石濤的議題

1.〈環繞石濤的「偽造」「偽鑑」問題〉⁵，徐復觀，《大陸雜誌》，第37卷4期，1968年8月31日，頁93~95。

按，是篇第一節以「假戶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對聯指出上海部份人士提出「研究石濤的歷史，應以石濤畫跡墨跡為主」口號的問題。第二節提出石濤請八大山人畫大滌草堂圖的書札有三種，他據大風堂藏本多出「向承所寄太大，屋小放不下」十一字斷定是為造的說明。第三節認為作偽者固然必須堅持他的偽鑑，誤鑑者也會將誤鑑變成偽鑑。第四節對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石濤的四封信提出石濤確實出過家，是一位孤零零的和尚。第五節認為石濤給八大山人的信上有「莫書和尚，濟有冠有髮之人」之說給予作偽者動機。第六節談阿問因第二封信而提出「化九」是石濤弟子的第一人之說的

³ 按，徐復觀《(增補版)石濤之一研究》，收〈自序〉、〈石濤畫語錄中的「一畫」研究〉、〈石濤晚年棄僧入道的若干問題〉、〈環繞石濤的偽造偽鑑問題〉、〈石濤生年問題--答李葉霜、王方宇各先生〉、〈讀無鳳「清湘遺人的五瑞圖」書後〉、〈再答李葉霜先生〉、〈石濤生年問題的餘波--敬答王方宇先生〉、〈石濤生年問題補記〉、〈石濤的畫語錄與畫譜問題〉等十篇。

⁴ 按，徐復觀《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收〈自序〉、〈中國畫史上最大疑案--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中國畫史上最大的疑案補論--並答饒宗頤先生〉、〈由疑案向定案--兼對疑難者的總答覆〉、〈定案還是定案〉及九件附件。

⁵ 篇末補記云：「五七、十、十一、中副刊有李葉霜先生〈再談石濤生年〉一文中謂石濤從廬山為蕭伯玉致書於錢牧齋，『是有石濤師兄喝濤同行』，這是絕無根據隨意編造出來的說法。」

可信度，並提出他在《石濤之一研究》已提出數名弟子之名。

2. 〈石濤生年問題--答李葉霜、王方宇各先生〉，徐復觀，《大陸雜誌》，第 37 卷 7 期，1968 年 10 月 15 日

按，是篇第一節表明因中央日報副刊刊出李葉霜〈再談石濤的生年〉及王方宇〈論傳抱石石濤上人年譜所訂石濤生年〉，實際都是針他和方杰人有關石濤的文章而發的。承認曾看過石濤的原跡，但認為鑑別畫跡真偽有四種方法；畫法、畫材、印章、題跋款識上書法，以及自己的文字考證上的鑑別方法。第二節引諸人作品談石濤、蕭伯玉及錢謙益三年相互間的關係。第三節談傳抱石據以推測石濤生年的材料，王方宇提出其疑處，表示其看法。第四節論在作品的真假混淆，瑜瑕不辨的時候，研究畫史的人，應當先養成文字考證的習慣。並於篇末補記，答覆阿問〈對石濤生年問題的感想〉提出的題有「五十孤行成獨往」詩句的「庚午長安寫此」的石濤畫冊為真的問題。

3. 〈石濤、喝濤及其他：答徐復觀先生〉，李葉霜，《大陸雜誌》，第 37 卷第 11、12 期合刊，1968 年 12 月 31 日

按，是篇首先說明他在〈再談石濤的生年〉說順治八年石濤從廬山遠行到虞山，為蕭伯玉傳書給錢謙益，有石濤的師兄喝濤同行。徐復觀不贊同而寫〈石濤生年問題--答李葉霜、王方宇各先生〉的事。因「喝是石濤的師兄，他幾乎是與石濤大半生形影不離的人」，引梅瞿山詩為證。接著解釋蕭伯玉、錢謙益二人詩文未提到喝濤的可能原因。第三則是就徐氏引蕭伯玉〈鄱湖望匡廬，退尋舊遊，次而記之以詩〉內容認為石濤當時不是九歲出頭的看法。第四是徐氏就他所增添的石濤生於明崇禎十四年的駁斥提出說明。第五是交待他對石濤〈五十孤行〉冊頁是用相機翻照寄給張大千，徐氏未見原冊，而產生「它是最笨拙的偽作」的說法。最後則據八大山人生於明天啟六年的資料無人認為偽作來證明石濤的年齡。

4. 〈簡答徐復觀教授(石濤生年問題)〉，吳同，《大陸雜誌》，第 37 卷 11、12 期合刊，1968 年 12 月 31 日

按，是篇就徐氏〈石濤生年問題〉提出：「吳同先生編的英文石濤目錄，在 1693 年下列有石濤是年冬畫餘杭看山圖」的說法，答覆：「我原來那段文字是說：『1693 年冬，為一未署干支的〈餘杭看山圖〉加跋。據此加跋，可知在 1693 年之前，石濤曾經法過位於杭州以西的道家

勝地大滌山』」。接著說：「該畫共有先後二次跋識」。第三則提出：「傅氏《石濤年譜》對石濤南歸時間毫無疑問是算錯一年，所以他收在一起的資料顯得彼此自相矛盾」。最後說明「英文石濤目錄是艾瑞慈教授所編，我從未說過是我編的」。

5. 〈再答李葉霜先生〉，徐復觀，《大陸雜誌》，第 38 卷 1 期，1969 年 1 月 15 日

按，是篇第一節係就李葉霜〈石濤、喝濤及其他〉一文的答覆。第二節就李氏找到「石濤由全州到廬山，是由喝濤行的證據」，推論石濤從全州到廬山時是十歲左右，提出二點反證。第三節就〈庚午長安寫此〉冊頁上「五十孤行成獨往」與石濤此時正在北京作客的背景示合。第四節認為八大山人年最可靠的說法是李旦〈八大山人叢考及牛石慧考〉所說的「明天啟甲子(四年，1624)十月生」。最後表明因不懂英文，所以連誤看的資格都沒有。

6. 〈畫人石濤若極宗翁的一些問題：依統計資料為徐復觀教授找尋證據〉，景唐，《藝壇》，第 199 期，1984 年 10 月

按，是篇內文誠如題目所記：「依統計資料為徐復觀教授找尋證據」，第一節徐復觀教授對石濤翁生年提出的三個問題，由款書統計，丁酉松鶴圖、丁酉菓品圖、酉春觀海圖三幅同為乙酉年(1705)作，證明徐氏認為「十七歲就有畫流傳，大概不可能吧」；「十一歲的小和尚，能於『刀劍輪邊杖錫飛』的情形下，從廬山送信到常熟嗎」的問題見諸徐氏的二篇文章；徐氏「對石濤翁向八大翁求畫的信」，必然是一真兩偽或三者都偽，由鈐印統計找到線索。第二節徐教授提倡款識考證，目看丁酉菓品圖款書「清湘老人」、「必然是假的」；松鶴圖款書「靖江後人」也該有問題；他用統計方法列舉居所、名號、鈐印以證明之。第三節石濤翁「棄僧入道」，向無定論，攤事實真相問題，用附表名號、鈐印部份，看僧是那一年棄掉，道是那一年入的。第四節徐復觀教授說，若在 1697 年以後，款書「仍用苦瓜和尚，濟山僧，小乘客」，這種稱呼，及印上「善果月之子，天童恣之孫，原濟之章」的印章，有理由斷定必是假的，未發現假畫，但見到鈐印。第五節石濤款印分析的構想，依據其手邊已建卡統計的資料，初步構想是編年譜，附各類分析表。

(二)黃大癡畫作的議題

1. 《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徐復觀，台灣學生書局，1977 年 5 月

按，是書〈自序〉⁶說：「這裏彙印的四篇文章，是年來為了討論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而寫的。」「1974 年暑假，寫了〈中國畫史上最大的疑案〉一文，在《明報月刊》107 期刊出，引起了一連串的熱烈討論，於是我前後寫了這裏彙印的四篇文章」。

2. 〈兩卷富春山圖的真偽：徐復觀教授「大疑案」一文的商榷〉，傅申，《明報月刊》，第 9 卷 3 期(總 111 期)，1975 年 3 月

按，是篇〈前言〉認為徐復觀發表有關書畫史的文字中，有不少的翻案文章，對於讀者有異見、有反證，應提出討論商榷的，第一節兩卷富春山圖的問題，就〈中國畫史上最大的疑案--兩卷黃公望的富春山圖問題〉中，認為無用卷出於偽造，子明卷是被剪頭去尾的原跡看法，分：書畫本身的我見、題跋問題、火殉問題三節討論。在書畫本身的我見中，從紙張、畫、畫家的題字、他人在畫面上的題記等直接與作品真贋最有關係的討論。在題跋問題中，認為徐氏以兩卷都有董其昌及鄒之麟的跋，是辨明真偽最有關係的跋，甚至沈周的也是臨本的看法，先後列出沈周、文彭、王穉登、周天球、董其昌、鄒之麟等人的跋討論以駁之。在火殉問題上，列舉 1651 年的沈顥、1652 年的吳其貞、1657 年的程正揆、1669 年王廷賓等記錄，證明火殉是事實的。

3. 〈黃公望是否居住過富陽問題--讀徐復觀「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以後〉，張光賓，《故宮季刊》，第 12 卷 4 期，1977 年夏季

按，是篇〈前言〉提出三點說明，1.就徐氏《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收錄四篇文章與〈序〉所討論的內容，翁同文、傅申等人的文章，最近始有機會陸續研閱而寫的。2.表示，《元四大家》的出版，非徐氏所云「對這次討論的反應」。3.就徐氏判決「無用師卷的關鍵性問題」，黃公望是否居住過富春或富春山問題，提出覆按。第二節常熟人抑富陽人？與晚歸富春的考察，是將明清方志有關黃公望傳的資料，分：甲、謂富陽人；乙、謂常熟人、歸富春者；丙、常熟人，寓永嘉者；丁、永嘉人，隱笕箕泉者等項排列。第三節「富春山」、「富春」山？及大癡山居環境，是解釋因句讀問題產生的疑惑。第四節黃公望晚年行蹤及其交遊。第五節總結，提出：1.黃公望晚年

⁶ 見《中華雜誌》165 期，1977 年 4 月。

回到富陽縣，富春鄉，春明村，也就是在廟山附近的「山居」。2.董其昌稱「無用卷」為「富春大嶺圖」，與「富春山圖」，因為他知道大癡晚年歸富春是事實。3.憚南田據吳靜安所述而記錄的，因為南回在錢塘進過，對那裏的情形一定清楚。4.考據，對古畫鑑別，固有其重要性，但是仍屬參考資料，等級略高而已。5.應將注意力放在子明卷上，考察其究竟出於何時何人之手。

4.〈翰林院，文淵閣，其他(答徐復觀拙作董其昌服官的年份問題，徐文題「中國畫史上最大的疑案補論」)，史達，《明報月刊》，第9卷3期(總111期)，1975年3月

按，是篇乃因作者〈董其昌服官的年份問題〉發表後，徐復觀〈中國畫史上最大的疑案補論〉提出根據明史選舉記載，就學文淵閣不限於庶吉士，修撰編修亦預其列，與「三年學成，優者留翰林院編修檢討」的關係，加以說明。就董其昌於萬曆二十四年，持節吉藩至長沙後，徐氏認為「旋以編修原官歸里」的問題，提出因尚未得確鑿證據所致，不敢臆測列於表中。

(三)曹頌筆跡的議題

世人討論「脂硯齋」本的《石頭記》迄今亦十分熱絡，這個「曹頌筆跡」的議題，與徐復觀〈趙岡《紅樓夢新探》的突破點〉內容有關⁷，兩人僅著重於「曹頌筆跡」的與甲戌本脂硯齋《石頭記》是否同一鈔者，故列於「談藝術」的第三單元。

1.〈論「抽樣」之不可靠曹頌的筆跡與《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作者問題〉，徐復觀，《明報月刊》，第5卷11期(總71期)，1971年11月

按，是篇就趙岡〈從曹頌的筆跡看《石頭記》鈔本〉，據故宮博物院藏曹頌兩件奏摺影本，和乾隆甲戌本《石頭記》鈔本的筆跡相對照，認為兩者的筆跡相同的論點而發。指出二者的筆跡中，奏摺的捺法與甲戌本的捺法不同，且是全般的差異，舉出「人」、「今」二字比較。指該篇僅舉十五個字，以不合於六書的字體結構，是所謂流行的俗體字，是當時某一範圍內的俗體字，歸結趙先生所抽出的字，不足

⁷ 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收〈趙岡《紅樓夢新探》的突破點〉、〈我希望不要造出無意味的考證問題〉、〈由潘重規先生〈紅樓夢的發端〉略論學問的研究態度〉等三篇，與《紅樓夢》(或《石頭記》)有關。趙岡《紅樓夢新探》後來收入《紅樓夢論集》，是書亦將徐復觀〈趙岡《紅樓夢新探》的突破點〉作為附錄。

以代表某一鈔寫者書法的特徵。

2. 〈曹頌的筆跡：再答徐復觀先生〉，趙岡，《明報月刊》，第 5 卷 12 期(總 72 期)，1971 年 12 月

按，是篇就徐復觀〈論抽樣之不可靠〉對曹頌的筆跡問題提出相反的意見，是實事求是的精神。首先說明這次討論是就〈從曹頌的筆跡看石頭記鈔本〉，從筆跡與字形證明是否同為曹頌的手筆，提出奏摺是寫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甲戌鈔本是 1767 年以後鈔成的，從曹頌不同年代所寫的奏摺，認為一個人筆跡會因時間而發生變化。就徐氏所提三個問題：一是把筆跡與字形混同起來；二是所挑出的十五個字當時在某一範圍內的俗體字；三是對他們所採用的統計方法有誤解，說明結果發現這十五個字的寫法特徵，都還保留著。

十、中西文化的討論

「中西文化的討論」議題，據《文星》(第 9 卷第 4 期)〈編輯室報告〉所說：「胡適之先生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的演講詞〈發展科學所必需的社會改革〉譯文，發表在本刊第 50 期(50 年 12 月 1 日出版)。此文涉及到東西方的文化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指出東方--尤其是中國文化，已經失去了靈性，否則不會容許婦女纏足的風氣延續了一千餘年。」⁸「他說得不夠清楚，因此引起了海內外文化界人士一片叱責之聲，駁斥他不該渺視中國文化，和不該倡導『全盤西化』論。徐復觀先生在《民主評論》上斥胡先生之言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胡適這篇演講，居然把很多人從睡夢中吵醒，就憑這一點衝刺性，已經夠瞧的了。……因此，對於最近發生的東西文化論辯，我們非常重視。」⁸因此，該期收錄徐高阮〈胡適之與「全盤西化」〉、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居浩然〈科學與民主〉、鄭學稼〈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黃富三〈與徐復觀先生論中西文化〉等篇。

1. 〈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徐復觀，《民主評論》，第 12 卷 24 期，1961 年 12 月 20 日

按，該文提出「現代只要配稱得上是一個思想家，當前大家不約而同的是對科學的反省，而不是對科學萬能的『讚頌』。」⁸「僅在常識上向

⁸ 按，《文星》第 9 卷 3 期〈編輯室報告〉說：「元月號的封面人物，介紹胡適博士，而請李敖先生執筆。我們為什麼要介紹胡適，因為他是『現代化』的播種者幾十年來，他一直為建設中國的新文化而盡力，因此，他是一個文化運動者，他的最大目的，是要把古老的中國社會，推向現代化的途程。」

他請教幾點」，實際是列出六點，如認為「在一般常識上，應當可以承認，科學技術的本身，是無顏色的。」如一面指責羅爾綱以概方式論斷歷史的某一階段的某一特定問題，是不科學，卻僅用幾句斷定中印兩大民族幾千年的文化。如認為那怕是極原始性的民族，也有有價值的心靈活動。如包小腳是否就等於中國文化。如認為印度的文化，是宗教文化，而有階級制度的問題。如中國印度文化如有一分好的，胡適博士代表政治出席國際會議，何妨講一分好的，以顧國家的體面。

2. 〈與徐復觀先生論中西文化〉，黃富三，《文星》，第9卷4期，1962年2月1日

按，是篇針對徐氏〈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而發，首先就「科學並非萬能」的說法，提出對「萬能」的解釋。接著就徐氏所提六點逐駁斥。如「徐先生根據社會學的受外力干擾而不能得到共同的結論，來推翻科學的必然性，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如「如果以我們古代文化曾壓倒西方，就斷定我們今的文化也壓倒西方，這種違反邏輯的推論，徒然引人發笑」。對「徐先生提出三個有關中文化與包小腳的問題來責問胡先生，裡面充滿了對時間觀念的混淆」。認為「徐先生談印度宗教的階級問題」，「所犯的毛病，是時間觀念」。但贊同徐先生勸胡適之說，如果中國文化有一分好的也應該說，以免在洋人面前失面子。

結語

事實上，學者們對於徐先生著作、論點的討論，還有對他《王充論》⁹表達的不同見解，但發表的時間是在1984年之後(徐先生逝世於1982年4月1日)，如周桂鈿〈王充偶然論試析：同臺灣學者羅光、徐復觀先生商榷〉(見《浙江學刊》，第6期，1984年11月)，劉謹銘〈王充重知識輕人倫道德嗎？--徐復觀論點之商榷〉(見《中華人文社會學報》，第5期，2006年9月)，雖篇名有「商榷」的字眼，但實已未能有互動性「商榷」作用，故不列入「與近人學術討論」範疇中。

⁹ 按，〈王充論考〉，除引言外，共收入：後漢書王充列傳中的問題、王充的遭遇與思想的關鍵、王充學術思想的特點、王充在學問上的目的、王充的理解能力問題、王充所運用的方法問題、王充疾虛妄的效率問題、王充的天道觀、牽涉到的科學與迷信的問題、王充的命運觀、王充的人性論等，十一個單元。